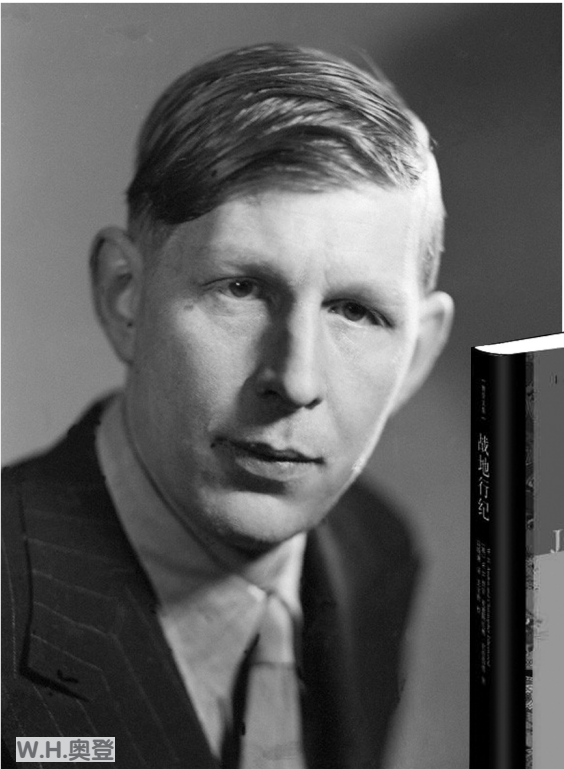


经典



W.H.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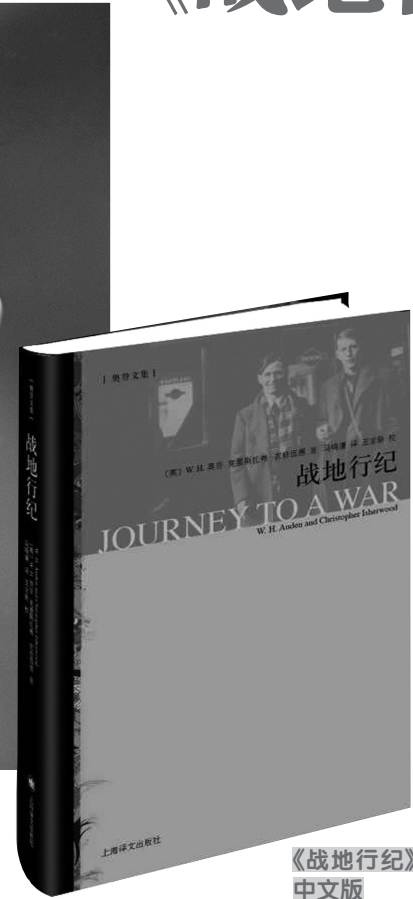
## 《战地行纪》产生的大背景是什么？

对欧洲来说，1938 年是个沉闷之岁；离二战爆发还有一年，各国坐在火山口上，仍维持着微妙的对峙平衡；那边，西班牙弗朗哥在德国援助下击败了左翼力量，奥地利行将被德国吞并，而英国还在执行绥靖政策拖延时日，根本想象不到两年后的敦刻尔克撤退。一句话，新闻界和知识界双双遭遇了所谓的“题材枯竭期”。此际，中国正值抗战进入第二年，鹤立鸡群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前线，当仁不让地成了世界热点新闻的来源地。彼时尚是纸媒为王的时代，作家担负起战况报道的临时职责，对市场导向的媒体出版界来说，也是颇为正常的反应。作家的身份比较灵活，没有新闻报道的时限限制，又可作深度的观察与评论，倘若文笔又很好的话，他们的专文比之报章记者发出的干巴巴的电讯稿，可读性要强很多。

一时间，民国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好不热闹。

3月9日，英国诗人奥登和作家衣修伍德到武汉的第二日，就出席了由国民党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外媒记者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让人惊奇：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密集的实地报道中国，在中外双方来说都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彼时在中国或到访过中国的英美诗人不乏其人，譬如燕卜苏和瑞恰慈，他们深爱彼时的中国，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写到中国；也有来了觉得隔膜，过后只



字没写的，譬如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英国诗人埃德蒙·布伦顿。而奥登在访问中国之后，却写出了极为重要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又称《战时十四行》）。

## 奥登和衣修伍德为何写这本书？

是应约而写。之前的1936年，奥登与好友路易斯·麦卡尼斯曾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写了一本旅行读物《冰岛来信》；次年交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初版就印了8000册（这个印数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奥登又成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这让奥登很受鼓舞，他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几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一个朋友说：“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

有了这个成功先例，蓝登书屋与法伯出版社再邀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诗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读物”，但指定了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适巧中日战事爆发，目的地已不言而喻。

来中国时，两人刚过而立之年，奥登31岁，衣修伍德34岁，他们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又好奇，又忐忑，就这么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他们是头一回在苏伊士以东地区旅行，既不会说中文，对远东情形也只是从书籍报章上了解个大概。

# 《战地行纪》：七十四年后的重访

□马鸣谦

这个年纪的奥登，正站在路向抉择的关口，用他后来那部作品的标题，他正处在自己的“焦虑年代”。

1937年，奥登出版了诗集《看，陌生人！》，并因这部诗集获得了国王乔治六世授予的国王诗歌金质奖章，在英国正声名鹊起。在这个多事之秋，他俨然成为了民族代言人。这一年他曾去西班牙待了一阵，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又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几星期后，他悻悻离开了西班牙。此后，在《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死亡的机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了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总之，西班牙之行对奥登来说不怎么愉快。他已深深厌倦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当时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此时的中国正是法西斯主义与正义力量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中日战争正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遥远的翻版；启程前，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像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之前在西班牙一无所获。

这本书的诞生，自有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这里，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

## 奥登和衣修伍德一路都见了哪些人？

在广州，拜会了笑声不断、说着蹩脚英语的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后面和广东省行政长官吴铁城吃了顿饭。

在汉口，于外媒新闻发布会上再遇同船来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荷兰人弗恩豪特（伊文思《西班牙大地》的摄影师）；其后先是拜访了担任国民政府私人顾问的陈纳德将军，经将军引荐，又见了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冯·法肯豪森将军；结识了风风火火、有些神经质又不失可爱的史沫特莱，由史沫特莱写了介绍信，又去见了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博古；3月14日，由陈纳德引荐，两人采访了蒋夫人宋美龄，领略了夫人的谈吐风采，像模像样

问了若干问题后正欲离开，又巧遇正好上楼来的蒋介石，而蒋本人“在这个私人场合，显得和蔼而腼腆，为拍个合影，站着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

在西安，见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徐州，见到了李宗仁，然后去了台儿庄战区前线。

回汉口，参加了一个知识界欢迎茶会，与会的有副作家田汉、洪深，诗人穆木天，还有会写诗的将军冯玉祥，“他是那种如鲸鱼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无言而自威”。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唐纳的采访。访问了武汉大学，见了10多个教授，其中有文学院院长陈西滢，他的夫人凌叔华送了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各一把扇子作礼物。这还没完，两人几日后又在保镖簇拥中拜会了青帮大佬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担任了红十字会要职，正为筹划战地医院而出力；而奥登在去给史沫特莱拍照时，又巧遇了周恩来，他们作了交谈，奥登还给周恩来拍了照。

在南昌，见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金华，见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将军。

在上海，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介绍他俩认识了出版人和诗人邵洵美，最后还拜会了路易·艾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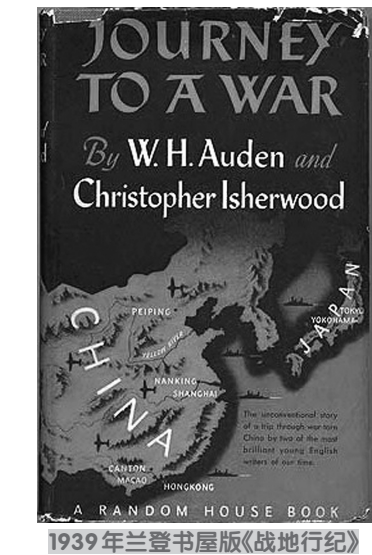
检视这份名单（还漏了很多有名无名的中外人士、贩夫走卒），我们发现它几乎将当时活跃在中国的政军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扫了个遍。由此可以设想，他们此行定然得到了英国驻华各使领馆的大力襄助和预先安排，而国民政府亦亟需外籍记者和作家对中国抗战的跟进报道，官民上下全体配合，在外宣方面张开了热情欢迎的怀抱，于采访接待的诸多细节上都做足了文章。

奥登和衣修伍德这一路可谓是畅通无阻。

## 《战地行纪》除了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如何？

《战地行纪》从外部人的视角，为我们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抗战中的中国，没有夸张，没有渲染，并不回避社会与人性的灰暗面；加之奥登和衣修伍德本就有些顽童脾性，他们笔下的中国拼图感觉很混搭，甚至有些可笑，但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这样出现的国人的面目却显得真实而单纯。那时，正是整个民族意气昂扬、空前团结的年代。

当然，它更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收入此书的《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亦



称为《战时十四行》)和其他诗篇，正是奥登步入成熟期的标志性杰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组诗的前12首都与人类史有关（从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圣经文学取材），每首都借用了不同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与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和中世纪基督信仰的消亡；从第13首开始的后一半作品则开始切入当前的战争实况，很多都取材于此次中国行的真切感受。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在《早期奥登》一书中，评价《战争时期》组诗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

收入本书的奥登诗篇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名闻遐迩（虽然并没有完整翻译过来），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和对中国抗战的考察，特别是经由《战地行纪》的诗歌创作，诗人奥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催生了他终其一生的人文情怀和怀疑精神：“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

## 奥登诗歌的最早翻译者是谁？

虽然穆旦、卞之琳、杨宪益、王佐良等诸位前辈都曾译过奥登，但从时间点来说，最早翻译奥登作品的当属海上闻人邵洵美，而最早出版奥登译著的当是翻译家朱维基。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译介并没有如后来燕卜苏在西南联大的授课那样，在中国文坛引一股“奥登风”。

如前所述，奥登和衣修伍德在上海期间便与邵洵美结识相交，他们之间有过诗文方面的交流和互赠；及至奥登他



奥登(右)与衣修伍德

们刚离开中国，邵洵美便开始着手翻译奥登诗作了。1938年12月1日，他在自己主编的《自由谭》1卷4期上刊出了奥登《战争时期》组诗第18首（中文题名为《中国兵》）的译文，此时，奥登与衣修伍德合著的这本《战地行纪》还没有正式出版；其后，邵洵美又连续在《南风》第一期（1939年5月15日）、第二期（6月15日）、第五期（9月15日）推介奥登的作品，称之为“我们所切盼的‘伟大的作品’”。

另一位较早译介奥登诗歌的是朱维基先生，他的名字在今人耳里听来已很陌生，却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翻译家，曾译过弥尔顿的《失乐园》、拜伦的《唐璜》、但丁的《神曲》、《卢森堡夫妇诗选》等。1941年5月，上海国民书店出版了由他译出的奥登诗篇，收录了奥登在《战地行纪》一书中的前篇序诗6首，十四行组诗27首诗，以及篇末的诗体解说词；书前还附了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尽介绍了奥登跻身诗坛的背景、他的诗艺特点，还逐个解析了组诗每首诗的含义。尤须记取的是，恰在1938年，朱维基在上海与蒋锡金等人合编了诗歌刊物《行列》，创作了不少抗日诗歌；上海沦陷后，日方对爱国文化人士进行轮番迫害，他与陆蠡、夏丏尊、赵景深、李健吾等文化人士先后身系图囚，数遭酷刑，被监禁了好几年；而陆蠡先生更遭日本宪兵队杀害，在此也须铭记一笔。

《战地行纪》中的诗文告诉我们，文学中的正义实现，并不在于一时激愤的报道，也不会因自囿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文学声名的权倾堡垒就唾手可得，它需要写作者本人具备超越俗见的人格特质（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个特质更是深刻而冷静的洞察力，以及对语言本身的探索。

74年后，借着这本《战地行纪》的出版，奥登再度“来到”中国，值此《奥登文集》第一部出版之际，谨向他、衣修伍德以及所有的译介前辈们致敬。

天涯异草

# 《哈立德之书》：你看到哈立德的身影了吗

□石 英

《哈立德之书》是第一部阿拉伯裔美国小说作品，奠定了后世阿拉伯裔美国小说创作的基础。1911年，该书由美国托德·米德公司首次出版。这部小说不仅生动记录了作者埃敏·雷哈尼(Ameen Rihani, 1876—1940)早年移民美国的生活经历，更表现了他作为一位置身于阿拉伯传统文化、西方经典文化与西方现代科技与物质文明中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关系、民族、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审视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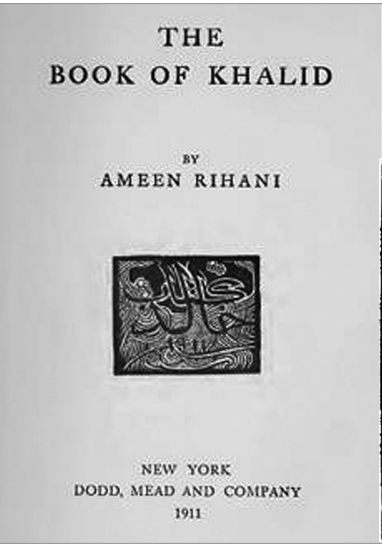
整部小说以解读“我”——小说的讲述者——偶然在开罗科第维亚图书馆发现的署名作者“哈立德”的手稿为主要内容，除去作为全书缘起和铺垫的序言部分，依照哈立德的手稿，共由三部分组成：“致我的兄弟——人类”、“致我的母亲——自然”、“致我的创造者——上帝”。这三部分历时性地记叙了移民美国前、移民途中、在美国以及重返故里叙利亚后哈立德的经历与思想。小说叙述结构清晰，一条是哈立德的手稿，一条是萨克伯(小说主要人物，同时也是哈立德的挚友)的回忆性口述和他的《个人史》，而作为旁观者与记录者的“我”不时插以评论，三者或平行或交叉，将哈立德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以大大小小的“片段拼贴”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带有浓郁的传记色彩，完整讲述和记录了哈立德的一生。哈立德的家乡在黎巴嫩附近的一座普通小城巴尔贝克，那里有着纯净静谧的自然美景，但却笼罩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高压与沉闷严苛的宗教约束。哈立德出生在一个马龙派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本分的信徒，而他本人却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向往自由，与古朴沉闷的黎巴嫩小城格格不入。不过，他即使因此伤痕累累，也始终毫不妥协。从一头驴子起步，哈立德用短暂的几年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拥有巴尔贝克最好的马，意气风发的他很快就不再满足于此，而将目光转向更远的方向：“他从没满足于可见的地平线，无论

它多宽广多美丽。他的灵魂总是渴望远在视野外的，看不见的远方。”不久，哈立德将自己的马卖给了一个旅行者，得到100个英国金镑，用这笔钱他和朋友萨克伯一起去了美国。移民之旅让两个天真的年轻人吃足了苦头，几经波折后，带着被榨干的钱包和满身的疲惫以及对人性丑恶的更真切了解，他们终于到达美国，落脚在纽约一个叙利亚人社区。最初的日子极其艰苦，他们租住在一个终日积水的阴暗破败的地下室，像那一时期大多数来自叙利亚的移民一样，以免售所谓来自“圣地”的宗教小饰品为生。好在他们的精打细算与用心经营下，日子一天好起来。随着生活的逐渐稳定与经济压力的减轻，哈立德渐渐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一直盘踞在他内心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少年时代就执著的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伟大、崇高与神圣的人生的追求，再一次令他心绪难宁。往日令他开心满足的买卖行当，此时在他眼中成了无耻的欺骗。他不再和萨克伯一起卖货，甚至最终当众烧掉自己的货品与货担。

同时，他带着盲目的狂热，懵懂地探寻实现伟大、崇高与神圣人生的途径。他苦学英语，希望能从西方文明中找到答案。他彻底荒废了生意，日日流连于二手书店，将积蓄花于买书、读书、听演讲，直到一次因无钱付费而被自己崇拜的偶像冷酷地拒之门外，他才幡然醒悟：“这些人根本不是自由思想家，而是厚颜卑鄙之徒，他们大肆宣讲精神的洁净之道，其实他们自己的心灵与灵魂才最该好好清洗净化。”

偶像的不一言行，使他借助文化拯救灵魂、实现神圣人生的期望破灭。失望之余，他转而迷信自己的直觉。一把火烧掉自己的所有西方典籍后，他一头扎入醉生梦死的波希米亚生活。遗憾的是，从那里他仍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失望的哈立德又做了多次尝试，做过律师助理，还当过社区竞选募捐员，对于西方社会的法律与政治体制，他曾满怀热情，但最终的



《哈立德之书》英文版

惨淡结局，令他心灰意冷。由于坚持道德操守，坚守人生信仰，他甚至因揭发上司而获刑入狱。危难关头，萨克伯再次对他施以援手，在他的帮助下，哈立德才得以获释出狱。

哈立德曾对西方顶礼膜拜，认为西方无比神圣，无所不能，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他幻想破灭，心灰意冷之时，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巴尔贝克的群山与雪松林、慈爱的母亲和纯真的爱人——这一切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在外漂泊多年的哈立德，他渴望投入故乡的怀抱，抚平身心的疲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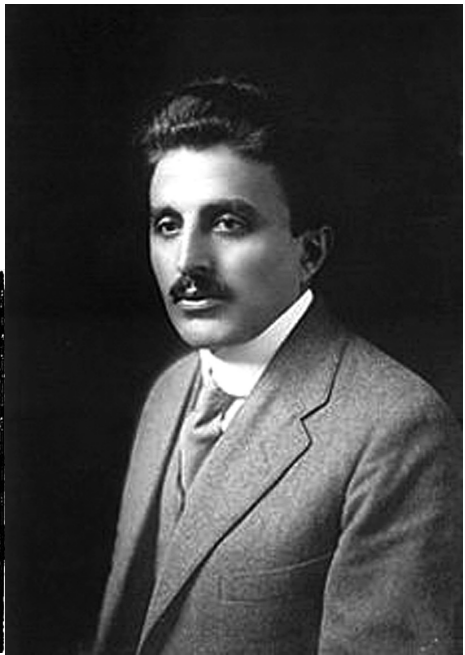
出狱后，哈立德和萨克伯积极准备返乡。筹足旅费后，两人毫不留恋地离开了美国。然而，返乡并未给哈立德带来期待中的慰藉。多年的美国生活早已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他，与少年时期相比，青年哈立德与周围环境更加格格不



《哈立德之书》插图

入。回到巴尔贝克不久，他就和当地的马龙派教会起了剧烈争端。他不仅仍然拒绝参加宗教活动，拒绝履行教徒义务，而且还在教堂附近散发小册子，宣扬“异端”思想。神职人员的劝讲，家人的斥责、怒骂和乞求，对他都毫无作用。他被教会视为异端，被亲友邻里孤立，给自己及家人都带来了巨大压力。更令哈立德痛心的是，自己的不妥协使他与表妹玛丽、奈佳玛的结合得不到教会的承认，奈佳玛终日以泪洗面。随着矛盾的积累与升级，最终，哈立德被教会开除，被父亲赶出家门，爱人玛丽也终嫁他人。带着破碎的心与破败的身体，哈立德黯然离去，隐居山林。

雪松林的隐居生活，使哈立德多年的追求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静修冥想中，哈立德不再拘泥于一人一事，或某个种族或民族，他将视野投向了全人类。



埃敏·雷哈尼

在他看来，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不仅仅意味着叙利亚地区人民的解放，而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终极自由。与现实全人类进步与解放的崇高目标相比，复兴阿拉伯民族只不过是渺小的目标。而且，“自然”才是人类发现生命伟大、崇高与神圣的终极所在，但由于人类渐渐远离自然，外在的物欲如尘土一般渐渐蒙蔽了这些美好的天性，于是，人类堕入愚昧、贪婪和凶残，欺骗和争斗纷起，从此陷入不尽的痛苦。因此，崇高与神圣不在于外部的教旨，找回人类生命意义的惟一途径是回归、聆听和拥抱自然。只有在朴素博大的大自然中，人类才能得到永不枯竭的力量，才能实现心灵的真正安宁。

隐居和冥思不仅治愈了哈立德身体的疾痛，平复了他多年纠结煎熬的心灵，更使他跳出个人得失的桎梏。他不顾友人的劝阻，毅然结束隐居生活，重踏俗世，

勇敢地去履行自己的使命。走出深山的哈立德视自己为阿拉伯民族与全人类的代言人，是自由解放思想的布道者。他走进一个个城镇乡村，向人们宣扬自由解放的思想，鼓励叙利亚人摆脱奥斯曼政权的统治。他的政治见解与宗教思想很快引起轰动，有人视他为先知，对他推崇有加；有人视他为异端，欲除之而后快。哈立德的言行不久就引起了奥斯曼政权的注意。他在大马士革清真寺的演讲，引发巨大骚乱，被土耳其政权下令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哈立德逃回巴尔贝克，在那儿与萨克伯重逢。从萨克伯口中，哈立德得知玛丽死了丈夫，还得了严重的肺病，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于是，逃亡中哈立德带上了玛丽母子，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可好景不长，玛丽的儿子因脑病夭折，悲痛欲绝的玛丽肺病复发，也很快死去，不久，哈立德也消失在茫茫沙漠，不知所踪，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哈立德去了哪里？这是每个读者掩卷后都心心念念的谜题。解答这一谜题不妨将目光投向小说的作者埃敏·雷哈尼——作家、诗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与哈立德相似，雷哈尼也来自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教徒家庭，同样也是在11岁时移民美国，其后同样返回了家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雷哈尼本人也曾同哈立德一样有过深山丛林中的隐居冥修。1905年，雷哈尼离开纽约回到黎巴嫩，在山林中隐居长达6年。小说中我们知道雪松林中的冥想带给哈立德精神世界的是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些大彻大悟不也正是雷哈尼本人思想的沉淀与升华？《哈立德之书》是雷哈尼6年冥修的思想成果，更是他人生前35年的重要记录与反思。这部小说既是雷哈尼青涩少年与纠结青年时代的真实摹写，也是一名阿拉伯青年知识分子在阿拉伯传统文化、西方经典文化与西方现代科技与物质文明碰撞中的精神历练记录，同时更是雷哈尼向古老的阿拉伯世界以及繁华浮躁的西方世界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它宣告了一个融贯东西的和谐大同世纪的开始。哈立德去了哪里？在走出深山，进入红尘，从此活跃于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世界，游走于各国政要与阿拉伯各族酋长之间，倾其一生不知疲倦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努力架起理解桥梁的埃敏·雷哈尼身上，你看到哈立德倔强不屈的身影了吗？